

中国劳动经济学

China Labor Economics

主 编 都 阳 张建武 王德文

学术委员会主任 蔡 昉

学术委员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鲁	王延中	孔泾源	左学金	田小宝
白南生	朴之水 (Albert Park)	刘燕斌		
苏海南	李永杰	李 实	李培林	杨云彦
杨河清	杨宜勇	何 平	宋洪远	张车伟
张俊森	陈金永 (Kam Wing Chan)			
金喜在	孟 昕	赵耀辉	胡鞍钢	姚先国
袁志刚	莫 荣	葛 强 (John Giles)		
曾湘泉	蔡 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10 年. 第 6 卷. 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097 - 1850 - 6

I. ①中… II. ①中… ②华… III. ①劳动经济学 - 中国 - 文
集 IV. ①F24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9818 号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10 年第 6 卷第 1 期)

主 编 / 都 阳 张建武 王德文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156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胡 涛
责任校对 / 李 娟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9.25 字数 / 276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850 - 6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CONTENTS

论 文

- 中国人口发展、农民工流动趋势与刘易斯转折点 陈金永 / 1
- 日本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 Ryoshin Minami / 25
- 韩国经济的转折点 BAI Moo-Ki / 52
- 中国经济的转折点：与日本的比较 南亮进 马欣欣 / 80
- “十二五”及中长期中国农民工转移形势分析
..... 许召元 胡 翠 / 110
- 教育水平、收入差距与劳动力市场 王云多 / 133
- 中国城镇失业人口的消费修匀及政策涵义
..... 孙婧芳 杜凤莲 / 145
- 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与适度性分析
..... 邬锦雯 张建武 / 158

调研报告

-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教育收益率
——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曲 玥 / 173
- 农村留守妇女劳动供给行为的实证研究 崔惠斌 / 195

文献综述

-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进展 周靖祥 / 214
- 劳动力流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内在关系研究的动态述评
..... 樊士德 / 245
- 家庭迁移理论综述 檀学文 / 267



CONTENTS

Papers

-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Kam Wing Chan / 1
-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
Ryoshin Minami / 25
-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Korean Economy
BAI Moo-Ki / 52
- The Turning Point of Chinese Economy: Compared with
Japanese Experience
Ryoshin Minami Ma Xinxin / 80
- The Long Run Prospect of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Xu Zhaoyuan Hu Cui / 110
- Schooling Attainment, Income Gap and Labor Market
Wang Yunduo / 133
- The Balancing Consumption of Unemployed Population
in Urban China and Policy
Sun Jingfang Du Fenglian / 145
- The Effect Factors and Analysis of Moderation in Guangzhou
Minimum Wage Standard
Wu Jinwen Zhang Jianwu / 158

Survey Report

- The Return Rates of Education under the Segmentation
of Labor Market: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mpanies
Qu Yue / 173

Empirical Study of Labor Supply Behavior of Women Left
Behind in Rural Areas

Cui Huibin / 195

Literature Review

A Survey for China's Rural Labor Mobility Research *Zhou Jingxiang / 214*

The Dynamic Review on the Internal Rel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Gap *Fan Shide / 245*

A Review on Theories of Family Migration *Tan Xuewen / 267*



中国人口发展、农民工流动 趋势与刘易斯转折点

陈金永*

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人口与劳动》（第1卷）主要探讨人口与经济的交互影响，尤其关注国内劳动力迁移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为了给该论文集后面章节提供基本的背景，本文对迁移人口和流动劳动力的统计及其近期趋势进行了简要的综合分析，这部分也可作为研究中国内部迁移的统计指南。本文第二、第三部分阐释了数据问题，并且利用数据分析迁移总趋势；第四部分介绍了论文集收录的14篇文章；最后，作者将对论文集涉及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刘易斯转折点”进行讨论。

关键词 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迁移；人口

* 陈金永 (Kam Wing Chan)，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

本文原为英文稿，发表于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人口与劳动》（Kam Wing Cha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in Cai Fang and Du Yang (eds.), *The China Population and Labor Yearbook, Volume 1: The Approaching Lewis Turning Point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Brill Publishers) 上。本文由程杰协助翻译，特此衷心致谢。中文译稿经过作者最后审阅。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人口与劳动》（第1卷）的“导读”部分，所以文中既有作者观点的表达，也有对该论文集相关内容的介绍。——编者按

一 引言

农村向工业部门提供的丰富廉价劳动力是中国过去 30 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20 世纪 90 年代和新世纪初期,“中国制造”风靡全球,这与农民工以仅能维持生计的低工资创造的出口是密不可分的 (Scott, 2006)。农民工已经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支柱 (Liang, 1999; Chan, 2007)。在出口导向型城市,如深圳和东莞,农民工已经成为这些城市劳动力的主力军 (约占 70% ~ 80%)。即使像武汉这样更典型的内陆城市,2000 年外来工 (指没有本地户口的) 也占到制造业就业人数的 43%^①。2007 年,估计农民工对北京和上海的 GDP 贡献率分别达到 30% 和 31%^②。

尽管人口迁移与流动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没有人能搞清楚迁移 (含流动) 人口的总规模,其主要原因在于这方面的主要统计数据有着不同的统计口径 (Liang and Ma, 2004; Thomas, 2001)。无可否认,迁移本身的确是较难准确测量的 (因为它比生死更具“动态”),而且迁移这一概念在中国的界定有别于其他国家所惯用的定义^③。正如本文后面所要探讨的,由于特殊的制度安排、人口与迁移管理体系以及统计体系等因素,中国的迁移统计变得异常复杂。在人口的流动迁移过程中,户籍制度扮演着核心的角色,由此导致相关的统计相当复杂混乱。在许多官方发表的报表统计资料中,非户籍的人口往往不包括在内^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将中国的流动人口称为“统

① 基于 2000 年武汉市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

② “农民工失业调查”,2009 年 1 月 9 日《财经》第 229 期, <http://www.caijing.com.cn>。

③ 这并非迁移数据独有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同样发生在就业和城镇统计中,参见 Cai (2004)。

④ 例如,虽然上海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之一,但是在 2006 年《上海统计年鉴》中,关于人口和劳动力的部分有 29 个表,仅有一表一小栏数据列出“外来人口”的数据 (表 3.3)。

计上看不见的人口”^①。这些问题往往影响到我们分析人口迁移、工业化、城镇化诸多相关的议题，例如争论激烈的“刘易斯转折点”（Green, 2008）。

《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人口与劳动》（第1卷）主要探讨人口与经济的交互影响，尤其关注国内劳动力迁移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为了给该论文集后面章节提供基本的背景，本文对迁移人口和流动劳动力的统计及其近期趋势进行了简要的综合分析，这部分也可作为研究中国内部迁移的统计指南。本文第二、第三部分阐释了数据问题，并且利用数据分析迁移总趋势；第四部分介绍了论文集收录的14篇文章；最后，作者将对论文集涉及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刘易斯转折点”进行讨论。

二 迁移和农民工流动的界定

有关中国内部劳动力迁移的研究一定要从户籍制度及其与迁移的关系出发。众所周知，“正式”的迁移在中国是被严格限制的，试图永久地或正式地改变居住地的人必须从当地政府获得转移户口的批准（Chan and Zhang, 1999）。对于城镇居民，一般情况下允许在同一城市内部改变户籍地（如在一个城镇内将户口从一个街道转移到另一个街道）。同样地，由于婚姻或其他合理的原因，农村居民在农村内部迁移通常也是被允许的。但是，涉及城乡之间户口变化的正式的（或者“永久的”）转移则被严格限制，除非得到公安机关的正式批准。这种批准不易取得，仅仅在迁移符合中央或地方政策并且有充分的理由时才能实现^②。一般来说，普通人要将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镇或从小城市迁到

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Transition and the State*, <http://www.undp.org.cn/downloads/nhdr/nhdr1999.pdf>. Roberts (2002) 持相同的看法。

② 过去国家招募劳动和征用耕地是户口迁移的主要途径，而最近，户口（购房落户）也成为地方政府“刺激”低迷的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工具。

大城市是非常困难的 (Wang, 2005)。改革开放以前, 户籍制度事实上相当于一个“国内护照”制度, 旨在阻止农村人口外流, 同时, 它也是一个“福利分配”机制, 以保障国家提供的福利仅限于服务城镇居民。目前, 这一制度基本上是利益 (尤其是福利) 分配的机制, 而不再被用来阻止人口的流动。也就是说, 农民允许进入城市工作, 但他们仍然不能获得当地的户口, 因此他们不能享受许多普通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本地社会福利。

因此, 我们可以将迁移划分为两类: 拥有本地居住权 (本地户口) 的移民 (后面称为“户籍移民”), 这类迁移的开放对象非常有限 (近年来主要是富人或高学历群体) (Chan and Buckingham, 2008); 没有户口居住权的移民 (“非户籍移民”)。

在中国, 只有户籍移民才能被正式称为“迁移”, 而其他方式的迁移均被视为“人口流动”, 这意味着一个“暂时的”、不能永久居住 (在法律上无权) 的流动。尽管实际上许多非户籍移民可能在某一地居住多年, 但在官方统计中仅仅将其视为“暂时的”流动人口。另一方面, 户籍移民在法律上被认为是永久居民, 并且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合法地位, 能够获得本地居民拥有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和权利。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 户籍和非户籍区别尤其重要, 因为这涉及不同的财政支出和行政职责。直到最近两三年, 中国各省市每年迁移的官方报表统计都是基于户籍人口的, 发表的仅仅是地方户籍人口的数据, 迁移人口的数据也只是户籍迁移的数据。直到近几年, 有些地方才公布了“暂住人口”的非户籍人口统计数据。除了户籍迁移, 在过去 20 多年来, 研究人员和统计机构也通过各种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来收集实际的户籍移民和非户籍移民的统计数据。由于中国大部分的人口流动具有循环性和临时性的特征, 要准确测算与界定流动人口并不容易, 技术性的问题较多。

表 1 显示了基于不同数据来源整理得到的中国内部迁移统计的总体情况。这些数据有些从迁入地收集得到, 有些从迁出地 (主要是村庄)

收集得到。尽管这些数据口径不一样,质量参差不齐,但是当把它们放在一起分析时,它们并不矛盾且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大体上合理,这将在下面进行解释。

表1 中国总体迁移主要的统计(1982~2007年)

单位:百万人

	户籍移民 (年度流量)	非户籍移民或流动人口(存量)					
		一般 估计	暂住人口			农民工	
			公安部 登记	全国人口普查/国 家统计局人口调查		卢迈等 (2002)数据	根据农业部 调查估计
地理范围	城市、镇或乡			乡镇或街道	县或市	一般指乡	乡
最低逗留 时 间	没有限制	通常 数夜	3 天	6 个月	6 个月 或 1 年	经常在乡镇以外就业	
指标	A	B	C	D	E	F	G
1982 年	17.3	20			6.6(1 年)		
1984 年	19.69	20					
1987 年	19.73				15.2 (6 个月)*		
1988 年	19.92	70				26	
1989 年	16.87					30	
1990 年	19.24				21.6(1 年)		
1991 年							
1992 年	18.7	60~70					52.8
1993 年	18.19	70				62	
1994 年	19.49					70	
1995 年	18.46	80		49.7	29.1 (6 个月)**	75	69
1996 年	17.51			60			
1997 年	17.85	100	37.3	61.8			
1998 年	17.13		40.5	62.4			79.8
1999 年	16.87	100	40.4	63.7			
2000 年	19.08		44.8	144.4			

续表 1

	户籍移民 (年度流量)	非户籍移民或流动人口(存量)					
		一般 估计	暂住人口			农民工	
			公安部 登记	全国人口普查/国 家统计局人口调查		卢迈等 (2002)数据	根据农业部 调查估计
地理范围	城市、镇或乡			乡镇或街道	县或市	一般指乡	乡
最低逗留 时 间	没有 限制	通常 数夜	3 天	6 个月	6 个月 或 1 年	经常在乡镇以外就业	
指标	A	B	C	D	E	F	G
2001 年	17.01		55.1	N/A			
2002 年	17.22		59.8	109.3			
2003 年	17.26	140	69.9	107.8			98.2
2004 年	19.49		78	106.6			102.6
2005 年	19.33		86.7	147.4			108.2
2006 年	20.6	150	95.3	128.7			114.9
2007 年	20.84		104.4	120.7			

注：* 地理范围包括城市、县和镇；** 地理范围以县为单位。

资料来源：

A：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群众出版社，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B：1984、1995 和 2006 年数据引自于学军（2008），其他数据通过各种资料汇编整理。

C：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全国暂住人口统计资料汇编》，群众出版社，相应年份。

D 和 E：国务院、国家统计局，《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国家统计局，《中国 1987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国务院、国家统计局，《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办公室，《199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国务院、国家统计局，《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国务院、国家统计局，《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F：卢迈、赵树凯、白南生，《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回顾与展望》，载于马洪、王梦奎主编《中国发展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报告选》，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第 555 ~ 587 页。

G：“农业部：今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达 1.1149 亿”，2006 年 11 月 27 日，<http://sh.shuangliao.gov.cn/nyzx/xwzx/nydt/nydt/200611/4168.html>；农业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载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主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第 86 ~ 98 页。

户籍移民指标 (A): 这一指标涉及户籍移民, 并且是表 1 中唯一的“流量”(flow) 数据指标。数据反映了每年正式获得目的地(城市、镇和乡) 户口地位的迁入移民数量, 这些户籍移民数据是公安部每年统计公布的。它代表了特定时期所有正式批准迁移户籍(居民) 的总数, 包括从乡镇到城市、从城市到城市、从乡镇到乡镇等, 但不包括城市和乡镇内部之间的流动。

非户籍人口指标 (B - G): 这些指标涉及一般称为“流动人口”的群体, 被定义为在户口登记地之外的某一行政区域(通常是城市、镇、街道或乡) 居住的群体。“流动人口”不是“法理人口”(de jure population), 从而导致与“实际人口”(de facto population) 数量存在巨大差异, 最极端的例子是深圳。与指标 A 的户籍移民“流量”(flow) 不同, 表 1 中显示的非户籍人口指标是移民的“存量”(stock), 即某一特定时点上某地居住的非户籍移民数量。基于不同的目的, 地理范围和最低逗留时间标准的界定也存在差异, 从而可以想象到, 在相同年份中不同指标测算的流动人口数据也可能不相同。

指标 B: 这一指标定义的流动人口涉及范围最广, 包括了全部没有本地户口的居民, 而不考虑其居住时间的长短, 可以是仅仅逗留一晚, 也可以是居住了几年。由此, 这一指标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人群, 包括旅客、出差人员、商人、短期逗留人员、农民工等, 而且包括就业和非就业人员。我们从媒体得到的此类人群的数据相互之间的差异经常很大, 反映出这一指标不够系统、问题较多。部分全国的总数据是通过简单估算得到的, 另有一些是通过抽样调查、铁路运输量以及(或者) 其他更可靠的指标(如 C、D、E) 推测得出。表 1 显示了在特定时点上中国媒体上公布的若干典型数据。鉴于指标的性质, 这些数据仅可以作为粗略趋势的参考。

指标 C: 与指标 B 不同, 这是一个系统的“流动人口”指标, 它是基于一个更狭义的流动人口概念界定。1997 年以来的数据都能够从公安部获得。根据规定, 任何人在户籍所在地之外的地方居住 3 天及以

上均要求在当地派出所作暂住登记。因此,这一类人群也被当地公安部门划分为“暂住人口”。当然,很大一部分流动人口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这也是指标 B 和指标 C 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指标 D 和 E: 这两个指标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一个统计系列,只是口径略有不同。人口指标的界定首先是有没有本地户籍,其次考虑居住时间。D 和 E 规定了一个比 B 和 C 更长的最低居住时间(6 个月或 1 年)的口径。因此,即使地理范围的界定相同,指标 D 和 E 也将比指标 B 和 C 反映的人口数量少。国家统计局也将这部分人群称为“流动人口”,有些研究人员也称其为“temporary population”(暂住人口)(Yang, 1996)。其实,大部分真正“暂住”的人群(居住时间短于 6 个月的,如旅客、短期农民工)并不包括在这指标内。近两三年来,国家统计局开始在各类的统计年鉴上,正确地将这部分人群(居住时间超过 6 个月的)视为统计上的当地的“常住人口”,这样的做法,跟国际接轨,更能反映实际情况。表 1 内指标 D 和 E 的数据来自于全国人口普查(1982、1990 和 2000 年),1987、1995 和 2005 年的“小普查”(1% 全国人口抽样调查),以及 1996 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实施的年度抽样调查。即便在相同年份(如 1995 年),指标 D 的统计数值也比指标 E 大,因为指标 D 的人口迁移被界定在更小范围的地理或行政单位。

指标 F 和 G: 这两个指标涉及特定移民群体,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这也是“流动人口”的最大组成部分。农民工是指从农村地区流出的劳动人口,他们在迁入地生活但没有本地户口^①,相关数据通过农村抽样调查收集得到。农民工大多数是非技术或者低技术工人,而且有些农民工的流动具有季节性特征,每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流动 2~3 次。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随着农民工规模开始增长,几个全国范围的农民

^① 这里不是“农民工”的广义界定,广义的还包括在本乡镇内的乡镇企业和农村企业工作的人员。

工调查也随之实施。但是,大部分调查多是一次性的,数据相互不完全可比(因为口径不同)。表1中显示的这两个指标,采自部分学者引用的来自于农业部固定观察点的年度全国抽样调查。全国农民工的总体数量通常是根据抽样调查的农民工比例估计得到。农业部固定观察的样本分布在全国300个村7000个农户,它所用的定义与一般通用的农民工概念非常接近。根据这个定义(指标G),在21世纪初期,全国大约有1亿~1.15亿流出的农民工。该指标覆盖了较长的时期(1992~2006年),而且相对其他数据具有更强的内部一致性。最新的农民工(大概基于近似的定义)数据来自于中国第二次农业普查,2006年规模达到1.32亿人(于学军,2008)。

三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迁移趋势

根据表1显示的数据,可以确定几点总体的迁移趋势:在过去的25年,尽管全国迁移(含流动)总体数据处于增长态势,但是由公安部记录的户籍移民的年际变化并不大,基本稳定在1700万~2100万人之间。实际上,相对于中国人口规模变化,户籍移民比例已经稍有下降。根据公安部发布的详细户口数据,1993年以来,80%~90%的户籍迁移发生在城镇地区。户籍移民数量每年相对稳定以及城镇地区的高比例,反映出政府对跨城市和跨乡镇户口迁移的强烈干预,而这一干预机制通常以户口配额(总量控制)来实现。

另一方面,表1显示出,非户籍移民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基本上一直在增长。以指标B为例,流动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快速增长,到1988年已经达到约7000万人,之后由于经济紧缩计划使其在1989~1991年间下降,但是,从1992~1997年再次迅猛增长,1997年已经达到1亿人,而2006年普遍估计已经达到2亿人。同样地,在1992~2006年间,农民工(指标G)数量增长了一倍多,从5300万人增长到1.15亿人。图1显示了四个非户籍人口统计结果,总体上升

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值得关注的是，两个农民工指标（F和G）的对接较好地展现了1988~2006年的连续上升趋势。总体上，表1所显示的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和趋势，与其他相关研究大体一致（杨云彦，2004；赵树凯，1998；Scott et al.，1999）。2005年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发布的流动人口数据为1.474亿人（指标D），而向公安部门登记的流动人口（指标C）只有8670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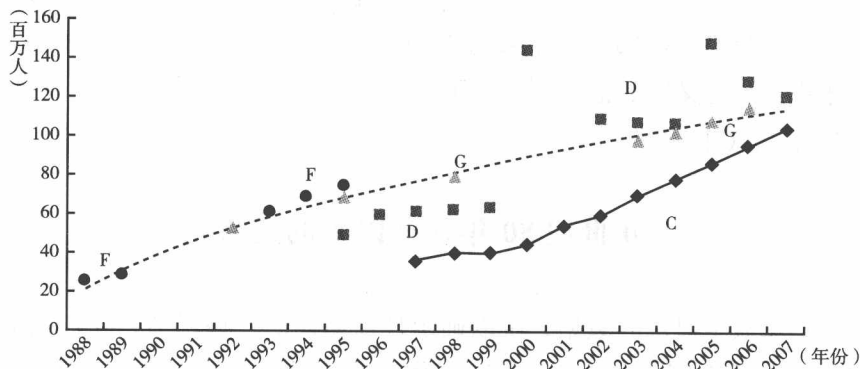


图1 1988~2007年非户籍迁移（流动人口）的变动趋势

说明：“C”、“D”、“F”和“G”涉及表1中的指标序列，“C”和“D”指“暂住人口”，“F”和“G”指“农民工”。

资料来源：同表1。

相对其他指标的数据，指标D的变动趋势显然不是那么平滑，存在明显的摆动：2000年和2005年两个数据点似乎明显脱离（高于）趋势线^①。另外，通过对数据的仔细观察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半

① 2000年和2005年数据的准确度应比其他年份数据更高，因为它们或者来自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或“小普查”（2005年），而其他数据则来自年度1%抽样调查。然而，作者的前期研究表明，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包括2005年“小普查”）可能高估了流动人口的规模，而年度1%抽样调查则产生了相反的误差，可能低估了流动人口的规模（Chan，2003）。考虑到上面的可能性，实际的流动人口规模（指标D）应该介于这两组数据之间，如此推测，2005年和2006年指标D的实际数值应该在1.3亿~1.5亿人之间。

期的移民数量增长趋缓，可以通过指标 C 和指标 D 反映出来。这主要归因于以下因素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减少：（1）这一时期城镇经济发展放缓；（2）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就业竞争；（3）地方政府排斥外来人口就业的保护性政策增多；（4）农村经济改善，至少 1996 ~ 1999 年间有此表现（Cai and Chan, 2000）。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的移民数量增长趋缓，这也与 Chan 和 Hu（2003）、蔡昉（2002）关于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总体趋势判断是一致的，因为农村向城市迁移占了 90 年代农民工的很大比例。早在 21 世纪初期，尤其是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恢复到较高水平。根据表 1 可以看出，2003 ~ 2006 年农民工的年均增长达到 560 万人，而 1992 ~ 2006 年的年均增长只有 440 万人。2004 年，经济增长更快的珠三角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①。如前提及，2006 年全国农民工规模达到 1.2 亿 ~ 1.3 亿人。但是，2008 年夏季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出口产业造成较大的影响，而这些产业正是农民工的集中地，我将在最后部分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本论文集后面的文章集中关注最近 10 年的情况，本文上面的内容主要为后面的文章提供有关的历史背景和统计上的关键问题。

四 论文集收录的文章

英文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年鉴：人口与劳动》（第 1 卷）收录了 14 篇文章，基本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过去两年编著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该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本论文集的主编。本论文集展现了该研究所的学

^① 2003 ~ 2006 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增长率约为 5.4%，而珠三角地区的东莞，2000 ~ 2004 年农民工年均增长率高达 18%。数据来源于东莞统计局，参见 <http://tjj.dg.gov.cn/website/web/zhetjnj/2005TJNJ/02/sheet004.htm>。